

中东政治

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

李艳枝

摘 要: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但运行至今的1982年宪法因强化总统权力、维护军方特殊权威、限制政党政治和公民权利自由而使土耳其民主政治呈现被监护的特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的修宪举措包括:2004年宪法修正案弱化军方权力;2007年宪法修正案为总统直选铺平道路;2010年宪法修正案根据法治和多元民主原则重塑国家司法机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努力突破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框架的尝试,为构建多元主义的民族认同指明方向,证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但由此造成的一党独大局面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悖论。

关键词: 土耳其; 正义与发展党; 宪法修正案; 民主政治

作者简介: 李艳枝,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沈阳 110036)。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2-0074-16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与民主政治相称的宪法是世界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追寻的目标。宪法与政党政治关系密切,一方面,宪法源于政党,宪法是政党活动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政党制度塑造了不同类型的宪法制度;另一方面,政党依赖于宪法,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尤其依赖于宪法提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① 宪法作为政治博弈和力量对比的产物,其修订和更新对政治、社会变革具有深远影响。

自2002年上台以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积极推动修订该国1982年宪法并颁布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尤其是2014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和2015年正义与发展党赢得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研究”(13CSS020)、辽宁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土耳其葛兰运动研究”(WJQ201400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研究”(15ZDA03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喻中《在宪法与政党之间》,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第3页。

二次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试图通过修宪来实行总统制,使土耳其的宪法修订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以民主政治视角考察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分析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为突破1982年宪法框架进行的各种尝试,进而揭示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

一、1982年宪法与“被监护的民主政治”

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军方在总参谋长埃夫伦将军的领导下发动政变,取缔所有政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统摄国家权力,随后制定1982年宪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选举法和政党法,确立了土耳其延续至今的宪政体系、制度框架和政党制度。1982年宪法是1961至1980年间土耳其国家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必然产物,该宪法严格限制民众权利和自由,存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趋向,被许多评论家戏称为“是的,但是,宪法”。^①观察家大多认为,1982年宪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国家免受公民的冲击,而非保护个人的自由免受国家的侵害”^②,这就有违宪政主义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统一的目的。因此,土耳其1982年宪法存在诸多与民主政治相悖之处。

首先,1982年宪法强化了总统权力。二战以来,土耳其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制。1982年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行政任命权,包括任命政府总理、召集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否决由议会通过的法律,负责将议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提交全民公决,就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提出异议,对内阁发布的各种行政命令的合法性做出判断,甚至可以宪法法院的名义干预议会等权力。总统还有权任命总参謀部长和一些关键性高级文官,包括大学校长、高等法院审判员和审判长;^③任命诸如宪法法院法官、最高行政法院法官、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成员及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④等司法官员的权力。^⑤在1982年宪法框架下“没有一个法定权威部门作为申诉机构,包括宪法法院在内的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依据总统个人的判断力进

^① Ergun Özbudun,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of Turkey: 1876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50.

^② Ibid., p. 44.

^③ 《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中译版参见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504页。

^④ 土耳其总统可以任命宪法法院的3名法官,最高行政法院的四分之一成员,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以及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等。

^⑤ Ergun Özbudun, “Turkey’s Search for a New Constitution,”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1, 2012, p. 42.

行。”^①有学者认为,总统权力的膨胀导致土耳其事实上实行的是半总统制政体。^②

其次,1982 年宪法巩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保证了军方的特殊权威和地位。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军方成员包括总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武装警察部队总司令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政府应优先考虑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涉及保护国家独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和保护社会和平安全等措施的决定。在 1982 年宪法框架下,军方和国家安全委员还获得重要特权和豁免权,如军方免于审计法院(the Court of Accounts)、高等监事会(the High Board of Supervision)的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政期间(1980~1983 年)通过的法律、法令不受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秘书长须由高级军官担任,并被赋予相当广泛的行政权力。

再次,1982 年宪法框架明确限制政党政治。1982 年宪法对于政党活动实行明确限制,不允许商业联盟、志愿组织、基金会、公共专业组织、合作协会支持政党活动或获得政党支持;宪法法院有权取缔那些涉嫌违宪的政党,并禁止其领导人参政。1982 年宪法出台后,大国民议会于 1983 年 4 月颁布政党法,对政党活动原则作出明确规定。6 月 10 日,大国民议会通过议会选举法,该法呼应和补充了宪法与政党法。为了防止议员过于分散,议会选举法第 33 条规定,大选中未得到 10% 以上有效选票的政党不能在议会中赢得席位,即所谓的“10% 门槛”。该规定一方面旨在避免土耳其政坛的混乱局面,防止小政党意见对国家大政方针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强化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达到少数服从多数的效果。然而,这种规定使得代表少数人的小政党因“10% 门槛”限制无法进入议会,不仅造成议会不能真正代表所有民众的局面,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联合政府频繁更迭的事实。

最后,基于 1982 年宪法的宪政框架限制公民的权利自由。以 1982 年宪法为依托的宪政秩序对土耳其民众的政治与公民权利实行严格限制,如限制新闻媒体和工会联盟自由,取消大学和国有电视台的自治地位;规定土耳其经济建立在自由企业之上,国家对经济实行监督作用。土耳其同期制定的其他法律也对政治、社会生活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1983 年的结社法严格限制结社活动,禁止士兵、教师、公务员和高中生组建社团,^③禁止专业团体和协会组织,如手工业者、工匠、建筑师、医生、律师、工程师、大工业家和商人组织参与政治或与政党有染。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权利和自由也受到限制,1982 年宪法第 26 至第 28 条规定,严禁使用法律禁止的语言发表言论和进行新闻报道,库尔德语成为土耳其宪法禁用语言;第 68 至第 69 条强调的“国家领土的不可分割”与“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统治”也限制了库尔德人的利益。

^① Frank Tachau and Metin Heper, “The State,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1, 1983, p. 29.

^② 陈德成《土耳其的多党制半总统制政体》,载《西亚非洲》2000 年第 2 期,第 46-50 页。

^③ Lucille W. Persner, *Turkey's Political Crisi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 99.

1982年宪法及其宪政框架下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规定。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的十多年内,尽管土耳其对1982年宪法的历次修订以着力提升自由民主标准为目标,但总体上仍未改变1982年宪法的监护性特征:1987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1980年政变之前政党领导人的参政限制;1995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对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多重限制;2001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1982年宪法中第26至第28条严禁使用法律禁止的语言发表言论和进行新闻报道的限制,并将司法部长和副总理吸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以降低其中的军官比例。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在修宪实践上继续沿用上述修宪方向。

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与民主政治的深化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一方面努力整合土耳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构建基于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努力摆脱“被监护的民主政治”,弱化凯末尔主义的影响。上述政治实践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一系列宪法修正案中均有体现。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针对1982年宪法先后提交过13份宪法修正案,其中10份修正案付诸实施,其余三份因被宪法法院判定为违宪或遭总统否决未获通过。^①其中2004、2007、2010年宪法修正案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构建意义重大。

(一) 加入欧盟进程与正义与发展党的初步修宪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权利和宗教自由、军方在政治中的角色、土耳其经济不稳定是欧盟拒绝土耳其入盟的重要障碍因素。^②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初,其修宪的主要目标是根据欧盟标准来完善国家政治制度,拓宽公民政治权利的范围。2004年5月7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宪法第9条作出修改,其内容包括为性别平等提供宪法保障,废除所有和死刑相关的刑罚,废除总参谋长对高等教育委员会成员任命权,取缔国家安全法院,废除税务法庭对军队进行审计的宪法障碍等。该宪法修正案还将1982年宪法的第90条规定修订为“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律关于基本权利和自由的立法发生冲突时,以国际条约为准”^③,使欧盟规范和国际公约在土耳其的推行获得优先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强化了人权、民主和法治相关条款。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以加入欧盟为由避开反对派对该修正案的质疑,尽管此举弱化了军方地位,但在“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旗号下,此次修宪通过政党之间的协商得以完

^①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ule,”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4, 2013, p. 100.

^② Ziya Öniş,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Challenges to the State: Turkey-EU Relations in the Post-Helsinki Era,” *Turkish Studies*, Vol. 4, No. 1, 2003, pp. 32-34.

^③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ule,” p. 101.

成,顺利获得议会通过。2004 年宪法修正案实施后,土耳其相继签署和加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国际经济、社会和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这些改革在 2004 年欧盟委员会的进展报告中都获得了肯定,欧盟委员会称土耳其已经达到哥本哈根标准的相关要求。2005 年 10 月 3 日,土耳其开启入盟正式谈判。与此同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允许在电台播放库尔德语的节目和在私立学校教授库尔德语;改变军方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增加文官数量;改革过时的教育、行政制度;调整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顽固立场,主张根据安南方案^①解决塞浦路斯的南北统一问题。这些改革措施颇具成效,欧洲部分媒体甚至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推行的改革称为“自阿塔图尔克之后的第二次革命”。^② 加入欧盟的现实需要是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之初修订宪法的主要动力,通过修改 1982 年宪法推行保障民主法治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使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步。

(二) 2007 年宪法危机与宪法修订

2007 年,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军方的激烈反对下,正义与发展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阿卜杜拉·居尔被迫退出总统选举。面对总统选举危机,正义与发展党呼吁提前进行议会选举,将危机解决方案抛给民众,并通过修改宪法推行总统直选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相似冲突。2007 年 5 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出宪法修正案,将议会选举总统制改为全民直选总统制,规定民选总统的最长任期为两个五年期,但该修正案被时任土耳其总统塞泽尔否决。面临僵局的正义与发展党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将原定于当年 11 月举行的大选提前到 7 月 22 日举行,以直接诉诸选民的方式来解决总统选举遭遇的宪法危机。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因获得 46.7% 的支持率和 341 个议席而蝉联执政,遂于 8 月 13 日再次推举居尔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居尔在前两轮选举中并未获得当选必须的三分之二以上选票,但在第三轮总统选举投票中,居尔获得 339 票,票数超过半数而当选总统。10 月 21 日,关于总统直选的宪法修正案在全民公决中凭借 68.95% 的民众支持率获得通过,选民的总投票率为 67.51%。^③ 然而 2008 年 3 月,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阿卜杜·拉赫曼·亚尔琴卡亚(Abdurrahman Yalçinkaya) 声称,正义与发展党已经成为旨在损害国家世俗属性的反宪法活动的中心,其在长达 162 页

^① 2002 年 11 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新方案,建议塞浦路斯仿照瑞士联邦的模式,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平等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其“总统理事会”由 6 人组成,总统和副总统每 10 个月在希土两族中轮换产生。理事会成员人数应符合两“州”人口比例,但每“州”至少应有两名成员;新构架下的高等法院由 9 名法官组成,包括每“州”各 3 名法官和 3 名非塞浦路斯法官。但在 2004 年 4 月 24 日的全民公决中,塞浦路斯希族有 75.82% 的选民反对安南的方案,土族赞成该方案的选票达 64.9%。安南方案并未生效。

^② Menderes Cinar, “Turkey’s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AKP Rule,” *The Muslim World*, Vol. 96, No. 3, April 2006, p. 470.

^③ Ergun Özbudun, “Turkey’s Search for a New Constitution,” p. 45.

的起诉书中指责正义与发展党企图利用民主方式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取消宪法规定的世俗原则,以正义与发展党通过废除头巾禁令的宪法修正案和坚持让居尔出任总统等证据,要求宪法法院取缔正义与发展党。7月30日,宪法法院就是否取缔正义与发展党进行表决,尽管宪法法院的法官超过半数(11名法官中有6位)支持取缔该政党,但却没有达到宪法所要求的勉强多数(3/5或11人中的7人),最终旨在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诉讼案遭遇败诉。正义与发展党通过修宪化解了总统选举危机,凭借民主程序免遭政党被取缔的命运。

(三) 2010年宪法修正案与土耳其法治建设

2010年3月20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再次以“加入欧盟、促进民主”的名义提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并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围绕自由与法治的主题,对1982年宪法未规定的某些权利和自由予以宪法保障,并根据法治和多元民主的需要,重塑宪法法院和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

首先,取消部分司法豁免权。2010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1982年宪法第15条、第129条和第159条赋予特定群体的司法豁免权。1982年宪法第15条曾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服务于军人政权(1980年9月12日至1983年12月)的内阁成员及其官僚、协商会议(1982年宪法的制宪会议)成员等群体豁免权,保证该群体不因在执政期间发生违反人权的事件而被调查或审判的权利。尽管1982年宪法第15条的废除,并不直接导致该群体会受到调查或审判,但毕竟清除了1982年宪法中不民主的因素,削弱了军方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2010年宪法修正案废除了1982年宪法第129条赋予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159号赋予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的司法豁免权。^①另外,宪法修正案的第9条主张引入议会督查专员机构(Institution of Ombudsman)以对议会实行监督,规定议会监督专员可以经过简单多数选举产生,实则由议会的多数派政党产生,这显然有利于一党独大的正义与发展党,而该条款也因涉嫌损害议会的自主权而遭到严厉批评,但这些修正条款仍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被监护色彩。

其次,调整宪法法院人员构成。2010年宪法修正案旨在通过增加宪法法院成员数、改变选举方式、成员任期、资格条件和法院工作方法以重塑宪法法院。1982年宪法第146条规定,宪法法院由11名正式成员和4名替补成员组成。2010年宪法修正案将该条款调整为,宪法法院包括17名成员,其中14名由总统任命,另外3名由大国民议会从审计法院提名的候选人、律师协会主席中选出。修正案第18条规定,宪法法院成员任期12年,不得连任。宪法修正案第19条引入了宪法申诉机制,规定由公共权

^① Serap Yazici, "Turkey'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Between the Status Quo and Limited Democratic Reforms,"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0, p. 2.

力机构来实施宪法审查权力。但该规定遭到上诉法院的反对,上诉法院认为此程序将导致宪法法院置于其他高等法院之上。宪法修正案第 20 条规定,宪法法院由一会两院组成,这是基于引入宪法申诉将增加宪法法院工作量的考虑。

再次,提高取缔政党的门槛。2010 年宪法修正案第 8 条提出,废除 1982 年宪法第 69 条仅根据政党纲领及其构成就将其取缔的规定,有助于提升取缔政党的门槛。该修正案废除了第 69 条第 8 段“一个永久关闭的政党不能以新的名字重新获得承认”^①的条款内容,使宪法更加适应土耳其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一调整令许多曾经遭禁的政党经改头换面后重新成立。该修正案还提出,废除 1982 年宪法第 84 条最后一段“如果议员因为其言行而导致其政党遭取缔,在宪法法院官方取缔公报公布之后,其议员资格将被终止”^②的条款内容。1982 年宪法第 69 条第 9 段规定,“政党创建者和成员因其言行导致其所在政党被关闭,五年内不得成为其他政党的创建者、成员、管理者或控制者,五年期限自宪法法院发布官方取缔公告之日起。”^③2010 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将前述条款中的五年期限改为三年。尽管 2010 年修正案对政党取缔条款的修订尚不彻底,但以宪法法院为首的司法机构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取缔政党。

最后,重塑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2010 年修宪前,土耳其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在人员构成上包括司法部长、副部长,总统从上诉法院和国家委员会(Turkish Council of State,即最高行政法院)提名候选人中任命的 5 名正式成员和 5 名替补成员。2010 年宪法修正案第 19 条规定,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由 21 名正式成员和 10 名替补成员组成,司法部长任委员会主席。该修正案赋予上诉法院、国家委员会、司法学院在高级法官与检察官中选出 15 名正式成员和 10 名替补成员的权力,另外 4 名成员则由总统从高级行政人员、执业律师、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中选出。此举旨在打破两个高等法院对于委员会的垄断,一方面,允许底层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加入该委员会,提升了底层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体系内部的代表性;另一方面,改变高等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成员的遴选机制,有助于将司法系统任命权同法官任命权一样,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增加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的成员数量、促进委员会成员来源多元化并提升其代表性,将终结其闭路循环模式,实现该委员会与高等司法机关的专业性增选,从而使该委员会更加民主和透明。”^④但是,此举客观上严重削弱了司法部

① Serap Yazici, “Turkey’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Between the Status Quo and Limited Democratic Reforms,” p. 7.

② Ibid., p. 8.

③ Ibid.

④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ule,” p. 108.

门的权力,且赋予政府更多权力来影响司法进程,这显然背离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

2010年宪法修正案中巩固基本权利与法治的条款,体现了土耳其民主化的进步。然而,土耳其反对党指责正义与发展党通过影响司法机关以控制司法权力的做法违反分权原则。在法官任命上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破坏了土耳其的司法独立性,令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中遭到抵制。该修正案因在大国民议会中未能获得2/3多数支持,最后不得不诉诸全民公决。2010年9月12日,2010年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举行,尽管遭到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的抵制,但该宪法修正案仍以52%支持和48%反对的公投结果获得通过。^① 埃尔多安宣称,“全民公决结果反映了变革的力量和意愿,是民主政治的胜利”。^② 2010年宪法修正案的实施是土耳其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步骤,但并未真正达到民众对于一部真正民主宪法的要求,此后,制定新宪法逐渐成为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政府努力的目标。

(四) 继续修宪与制定新宪法的努力

1982年宪法是在军方掌权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尽管几经修订,仍无法反映土耳其的社会现实、国家诉求和时代发展,因此埃尔多安政府将制定一部新宪法、突破有限民主的框架提上了日程。埃尔多安曾多次表达过对1982年宪法的不满:“现在通行的土耳其宪法也非常缺乏合法性……现在土耳其人普遍都认应该以新宪法替换(旧宪法),因为土耳其各政治集团都认为旧宪法无法保障基本权利。”^③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各政党、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欧盟都主张出台新宪法。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的竞选纲领中宣称,“我党将准备起草一部全新的、反映民众需求的宪法草案,根据民主法治原则适应民主国家的标准,确立一部新的社会契约”^④。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伊始即宣称,“我们将制定一部新的、参与广泛的、自由的宪法,以取代已不再满足公众需要的现行宪法。我们的新宪法将拥有高度合法性的民主、法治,符合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标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多元主义和参与性民主是其核心。我们将注重该宪法表达上的简洁和内容上的全面”^⑤。但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初期主要着

^① Doğu Ergül, “Constitutional Referendum: Farewell to the ‘Old Turkey’,”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4, 2010, p. 15.

^② “Turkish Premier: Democracy Won in September 12 Referendum,” *Today's Zaman*, September 24, 2010, <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222560-turkish-premier-democracy-won-in-september-12-referendum.html>, 登录时间:2013年3月12日。

^③ Patrick Scharfe, “Erdoğan's Presidential Dreams, Turkey's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Origins*, Vol. 8, Issue 5, February 2015,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erdo-s-presidential-dreams-turkey-s-constitutional-politics>, 登录时间:2015年6月20日。

^④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Programme,” http://www.akparti.org.tr/site/akparti/parti-programi#bolum_, AK PARTİ, quoted from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ule,” p. 98.

^⑤ Vahap Coşku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Rule,” pp. 98-99.

眼于修宪而非出台新宪法。

为赢得 2007 年大选,正义与发展党宣称将制定一部基于广泛认可的新宪法,该宪法将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欧洲人权公约》的标准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① 2007 年 6 月,埃尔多安成立由厄尔干·厄兹布敦(Ergun Özbudun)教授领衔的宪法起草小组;7 月,该小组向正义与发展党政府提交新宪法草案,反对者则称,该宪法草案有助于正义与发展党实现其隐匿的政治目标,即通过不受监管的多数统治在土耳其推行伊斯兰教法。为了避免局势恶化,正义与发展党搁置了制宪进程。2010 年 9 月,针对宪法修正案的全民公决再次激发民众对新宪法的渴望。2011 年大选期间,正义与发展党、和平与民主党(Peace and Democracy Party)主张制定一部由更多政党和公民参与的新宪法,尽管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不愿废除 1982 年宪法,但也对新宪法的制定持欢迎态度。2011 年 6 月的大选使正义与发展党获得了近 50% 的支持率,但其获得的议席却少于修宪或制定宪法所需要的五分之三席位。2011 年大选后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0% 的土耳其民众支持出台新宪法。^② 自 2011 年 10 月开始,由议会各政党成员组成的议会宪法调解委员会(Parliamentary Constitutional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着手制定一部新宪法。^③ 可以说,正义与发展党的第 60 届和第 61 届政府在执政纲领中都强调制定新宪法。尽管民众对制定新宪法的热情高涨,多数政党宣称支持一部更为民主的新宪法,正义与发展党也为达成共识放低姿态,但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军方和司法机构都倾向于维持 1982 年宪法所赋予的特权和地位,而且不同社会阶层在政治、社会取向上的分歧也阻碍了有关新宪法共识的形成。

2014 年 3 月,正义与发展党以超过半数的民众支持率赢得地方选举;8 月,埃尔多安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选举;随后埃尔多安及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继续推动大国民议会修改宪法,试图通过推行总统制赋予总统更大权力。2015 年 4 月 27 日,土耳其宪法法院新任院长表示土耳其需要新宪法,要求各方同时参与重新制定宪法章程,并达成统一意见。^④ 在 2015 年 6 月的大选中,尽管正义与发展党保持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 276 个议席未能达到简单多数,埃尔多安借出台新宪法推行总统制的计划宣告破产。由于正义与发展党与反对党联合组阁失败,在 11 月的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正义与

^① Ergun Özbudun and Ömer Faruk Gençkaya,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Turkey*,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7 - 111.

^② Ihsan Dağı, "Why Turkey Needs a Post-Kemalist Order,"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1, 2012, p. 29.

^③ "AK Party, CHP may Push for Partial Amendments to Constitution", *Today's Zaman*, 23 October 2013, 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Detail_getNewsById.action;jsessionid=93659EB20ACE12CF542E45A9CDAC777B?newsId=329603&columnistId=0, 登录时间:2014 年 5 月 26 日。

^④ 刘雯琦《土耳其宪法法院院长:我们需要一部新的宪法》,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5-04/29/content_35448019.htm, 登录时间:2016 年 1 月 8 日。

发展党获得 317 个议席 超过半数而得以单独组阁 ,埃尔多安再次高调提出修宪和实行总统制 积极谋求出台新宪法。12 月 23 日 ,埃尔多安会见农村领导人时指出 ,我们将见证一部新宪法的实质性进步 ,议会各政党不能再对此无动于衷。埃尔多安发表上述言论的背景 ,是议会反对党接受与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会见并商谈制定新宪法的提议。埃尔多安指出,“为了建立一种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制度 ,我们需要一部新宪法和总统制”^①。由于极力强化总统权力的埃尔多安将颁布新宪法、实行总统制、打造新土耳其作为建国百年愿景 ,土耳其出台新宪法指日可待。

尽管各方对出台新宪法保持乐观 ,但新宪法出台仍存在三大制约因素:第一 ,议会各政党在出台新宪法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正义与发展党目前控制大国民议会 317 个议席 ,但未达到修宪和出台新宪法所需的 363 席 ,仍需要其他政党成员或独立议员的支持。而正义与发展党与共和人民党、民族行动党和人民民主党等议会政党的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这些政党在制定新宪法的问题上尚不能达成一致 ,即使在出台新宪法上达成一致 ,也无法在宪法具体条款上形成一致意见。第二 ,不同社会群体对出台新宪法的立场分歧影响出台新宪法的进程。1982 年宪法基于军人执政的特定历史背景 ,其蕴含了对司法机构、军方和凯末尔主义者特殊权利的保护 ,尽管正义与发展党极力弱化其监护色彩 ,但现实利益促使这些势力阻止社会各界在新宪法出台上形成共识。第三 ,土耳其在制定新宪法时 ,需要充分考虑该民主政治的层次、市场经济总量、社会开放度以及土耳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等问题 ,这也是宪法制定者面临的棘手问题。目前 ,自行制定新宪法并提交议会和全民公决是正义与发展党克服这些障碍因素的唯一途径 ,其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正义与发展党修宪对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影响

宪法自问世以来 ,就具有三重属性: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和社会/公民属性。^② 宪法属性从政治到法律再到社会/公民的发展过程 ,是一个从低到高的演变过程。^③ 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体现了该党从关注宪法政治属性、法律属性到社会/公民属性的过渡 ,以及努力建构集政治属性、法律属性以及社会/公民属性于一体的新宪法模式 ,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力行宪政的有益经验。正义与发展党基于对当前土耳其民主政治局局限性的深刻认识 ,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宪法条款进行修订 ,积极推动出台新宪法 ,使宪法

^① “Time Ripe for Talks to Begin on New Constitution and Presidential System ,” *Daily Sabah* , Page 8 , December 24 , 2015 , <http://www.dailysabah.com/daily-paper/2015/12/24> , 登录时间:2016 年 1 月 2 日。

^② 宪法的三种属性也可以视为三个层次的宪法:一是政治的宪法 ,这主要体现在立法过程中 ,强调的是宪法目的及内容的政治性;二是法律的宪法 ,这主要体现在司法过程中 ,强调宪法作为一种高级法的法律实施;三是社会/公民的宪法 ,这主要体现在执行过程中 ,强调的是宪法与社会、公民的互动性。

^③ 欧阳景根《宪政挫折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95 - 196 页。

及其涵盖的宪政主义与土耳其现行社会发展相适应,这对土耳其民主政治向纵深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但其中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

首先,正义与发展党通过修宪实践努力突破基于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政治框架。土耳其民族独立和政治建构的合二为一使得推行凯末尔主义的政治精英摒弃传统统治模式,这些政治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强化西方现代性对土耳其政治社会的植入,使民主政治的色彩逐渐被威权政治所掩盖。掌控国家权力并推行凯末尔主义的政治精英试图通过在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领域推行世俗化改革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并效仿西方国家出台宪法、推行宪政代议制和多党制。凯末尔政权出于强化政治统治的需要,将宪法作为维护共和人民党一党统治的工具,无限强化其政治属性,导致宪法尊重民主自由的公民属性让步于对国家权力的巩固。1936年,凯末尔政权通过修改宪法将凯末尔主义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作为强调单一性、同质性的意识形态,排斥了民族来源的多样性和社会政治多元主义,与凯末尔政权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相契合。

二战后,凯末尔主义仍是土耳其多党民主制政治实践的依据。多党民主制的推行使得奉行伊斯兰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政党在土耳其兴起,但军方、司法机构等以凯末尔主义捍卫者自居,先后将四任民选政府推翻下台,尽管迅速还政文官政府的行为保证了民主化进程的延续,但当军方保持一种独立于民选政府的自治地位时,便为自己确立了一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监督权力。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以弱化凯末尔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和削弱军方对国家的权力控制为核心,该党上台后,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来弱化军方在国家权力中的特殊地位。正义与发展党一再声称,后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需要建立一种功能齐全的民主政治,使军人政治让位于民选的文官政府,并提出出台与后凯末尔时代相适应的新宪法,坚持认同多元性、尊重个人生活方式和文官高于军人等原则,甚至剔除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地位。“那些与国家公正相抵触的表达和意识形态选择,如阿塔图尔克主义^①、阿塔图尔克的原则和革命以及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都不应包含在宪法中。”^②不可否认,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影响了民主化进程甚至民主模式的构建,但其作为服务于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必须充分认识凯末尔主义对当代土耳其民主政治发展的限制作用,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巩固也有待于突破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政治框架。

其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公民的权利自由,促进了土耳其民族认同的多元化。从历史渊源的角度看,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充当着公民权

^① 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在1934年颁布姓氏法后,被授予“阿塔图尔克”(意即“土耳其国父”)的姓氏,故凯末尔主义也被称为“阿塔图尔克主义”。

^② Ihsan Dağı, “Why Turkey Needs a Post-Kemalist Order,” p. 31.

利保障书的角色。近代宪法发展趋势之一是宪法逐步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范围,正义与发展党尊重公民身份和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修宪实践顺应了宪法的发展趋势。1924年宪法赋予了公民自由权利,但共和人民党一党制统治导致大国民议会可以按自己意愿赋予或者限制公民的自由和权利,^①宪政框架下的民众权利自由并没有获得保障。尽管1961年宪法第10条规定“土耳其国家有义务消除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禁止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反对与社会公平及民主国家不相称的一切行为”^②,但在左右翼意识形态激烈斗争、极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高涨的背景下,民众的权利自由并未受到尊重。1982年宪法出于整饬社会秩序和平息社会动荡的考虑,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出严格限制,这也是正义与发展党修宪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土耳其民族主义旨在创建一个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现代土耳其的缔造体现了通过切断与奥斯曼的历史联系和削弱外部力量影响来净化土耳其历史与文化的广泛努力,包括赋予土耳其认同和土耳其民族主义活力以进行文化寻根的努力”^③,其实现路径之一就是公民权与国家进行捆绑。1924年宪法第88条强调“被视为公民的土耳其民众,不分宗教和种族,都称作土耳其人”^④,否定了所有土耳其公民的种族、民族或宗教信仰差异。1961年宪法规定“任何以公民身份附属于土耳其国家的人都是土耳其人”^⑤。1982年宪法对此界定进行重申,未考虑到土耳其民族与宗教的多样性。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倡导现行行政框架下平等的公民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赋予库尔德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并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民族财产权和自由,极大地提升了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地位。2010年宪法修正案提出保护个人信息、儿童权利、国外旅行、公民加入劳工组织、雇员集体谈判权等权利,体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在2011年“国家宪法协会伊斯坦布尔圆桌会议”上,土耳其多库兹爱吕尔大学(Dokuz Eylül University)教授美尔太·凯尼克里古鲁(Meltem Caniklioğlu)指出,土耳其宪法修订应关注对公民宪法权利和自由的保护。他认为,个人与政府都会侵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但宪法的本意可能不在于防范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而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通常会以各种手段和借口来为其侵权行为辩护,

^① Kemal H. Karpat, *Turkey's Politics: The Transition to a Multi-party Syst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37.

^② Asli Daldal, “The New Middle Class as a Progressive Urban Coalition: The 1960 Coup d’Etat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 5, No. 3, 2004, p. 97.

^③ John L. Esposito, *Islam and Politics*,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97.

^④ Levent Köker, “A Key to the ‘Democratic Opening’: Rethinking Citizenship, Ethnicity and Turkish Nation-State,”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2, p. 55.

^⑤ Ibid., p. 58.

因此对政府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防范是宪法修改的重点。^① 目前,土耳其正处于从一元平等的“同质性国家认同”向基于新宪政司法体系的“差异化平等”的“多元民主”过渡,^② 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的实现。

再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有机融合。在西方宪法发展史上,出现过两种典型的宪政主义,即民主宪政主义与自由宪政主义。欧陆宪法和英美宪法各执一端。前者建立在民主宪政主义的基础上,以人民主权为价值支柱;后者建立在自由宪政主义的基础上,以基本人权为价值支柱。^③ 建立在人民主权理论基础之上、诞生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民主宪政主义将宪法视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把民主视为宪政的基本前提,其制宪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民主制度。孕育于英国传统政治的英美自由宪政主义承认民主与宪政之间存在深刻的张力,其基本价值追求主要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个人权利和自由是对多数决定的民主权利的先定约束。不可否认,两种宪政主义都包含了民主政治的合理内核——人民主权和人权自由,但民主政治的构建是否必须以基于新教伦理的教俗分离为前提仍值得商榷,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性也曾引起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广泛质疑。长期以来,移植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凯末尔政权以民主宪政主义为模版,以法国的世俗主义模式作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导致土耳其宪政秩序下的民主政治以排斥宗教对政治的干预为前提,以强调人民主权为核心。但凯末尔主义的威权特色并未使人民主权落到实处,多党民主制的开启为代表民众意识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许多学者为维护西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而抛出中东例外论^④和伊斯兰例外论^⑤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教对民主的迟滞作用将使中东被排斥在民主化浪潮之外。但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在现行政治框架下对民主政治的推进,尤其是土耳其伊斯兰政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事实,使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亨

① 莫纪宏《宪法的更新——宪法法律秩序持续性框架中的宪法性权力——国际宪法学协会伊斯坦布尔圆桌会议综述》,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011.html> 登录时间:2015 年 1 月 20 日。

② Seyla Benhabib and Türküler Isiksel, "Ancient Battles, New Prejudices, and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Turkey and the EU," *Constellations*, Vol. 13, No. 2, June 2006, p. 230.

③ 贺鉴《北非阿拉伯国家宪法变迁与政治发展及其启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 年第 1 期,第 152 页。

④ Ghassan Salamé, ed., *Democracy without Democrats?: The Renewal of Politics in the Muslim World*,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4, p. 23; Simon Bromley,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Myth or Reality?," in David Potter et al., eds., *Democratiz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77, p. 323.

⑤ 参见 Bernard Lewis, *What Went Wrong?: The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Modernity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Bernard Lewis,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2003。

廷顿曾经指出,伊斯兰教的文化传统中也包含宪政民主的要素,其与宪政民主的精神存在一定的相容性。^① 埃斯波西托认为,伊斯兰主义者并不反对民主,而是主张伊斯兰化的民主。伊斯兰化的民主是基于对传统伊斯兰观念进行现代系列的重新解释。伊斯兰的协商、公议等传统经过重新解释,都可以成为支持民主议会制、代表选举制和宗教改革的观念,^②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为此提供了明证。正义与发展党在修宪过程中对国家政治体系的民主化改革显然出于强化民主宪政主义的考虑,对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强调符合自由宪政主义的要求,实现了保护公民权利与维护国家权力良性运行的有机统一,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宪政主义与自由宪政主义合流的趋势。正义与发展党提出“保守的民主”的执政模式,通过出台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弱化权力机构对宪法的控制,保障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实践了国家的法治统治,体现出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不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尽管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为建立整合伊斯兰主义与现代政治理念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但建构真正的民主政治仍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最后,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强化了其选举霸权和一党独大优势,对土耳其民主政治产生了负面影响。在宪政体制下,宪法为政党上升为执政党提供了两大路径:一是选举制度,二是议会制度。依靠这两种宪法制度,一个政党可能拥有议会中的多数议席,政党的党魁则可能成为总统或政府首脑。正义与发展党正是借助宪政制度的活动空间登上政治舞台,并蝉联执政至今。正义与发展党先后在2002、2007、2011、2015年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并单独执政,有学者称其为“选举霸权”^③抑或一党独大政治体制^④。正义与发展党自上台以来,确实为推进民主化进程进行过一系列宪法修订,但其“保守的民主”的政治定位使其不免将保守主义与民主相结合。正义与发展党一方面将政治工具化,把民主等同于议会多数主义;另一方面把宗教的权利主张和宗教自由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造成保守主义回潮的重要根源之一。尽管正义与发展党采取了以改革为基础的政治目标,但它未能实现保守主义和民主巩固之间的平衡,令其民主化举措大打折扣。从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历程来看,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弱化军方政治地位、转移国内矛盾,为该党争取了斗争主动权;2007年宪法修正案

①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2-378页。

② 参见[美]约翰·埃斯波希托《伊斯兰与现代化》,杜红译,载《世界宗教文化》1997年第1期,第17-23页。

③ Ceren Lord, "The Persistence of Turkey's Majoritar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7, No. 2, 2012, p. 237; E. Fuat Keyman, "The CHP and the 'Democratic Opening': Reactions to AK Party's Electoral Hegemony," *Insight Turkey*, Vol. 12, No. 2, 2010; E. Fuat Keyman,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The AKP Experience and its Limits," *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2, 2010.

④ Alı Çarkoğlu, "Turkey's 2011 General Elections: Towards a Dominant Party System?," *Insight Turkey*, Vol. 13, No. 3, 2011.

通过全民公决实现总统直选,为埃尔多安当选总统铺平了道路;2010年宪法修正案旨在加强对司法机构的控制,对调整宪法法院结构目的在于避免重遭宪法法院取缔的危险;正义与发展党出台新宪法的努力也是以维持该党的选举霸权为目的。因此,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多次宪法修订表明,其通过排斥军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加强对司法权的控制与影响,获取民众的更多支持,以扩大其影响力和谋求进一步政治延续性,其修宪实践更多基于执政党利益而非宏观的民主政治。同时,土耳其政党制度中的“10%门槛”成为其民主制度不完善的重要标志,不仅将在大选中未能获得10%以上支持率的小党阻止在议会之外,而且保证了正义与发展党掌控议会多数席位,在2002、2007、2011、2015年的大选中,正义与发展党分别获得34.28%、46.70%、49.91%、49.40%的支持率,但却获得议会66%、62%、59%、57%的席位。^①正义与发展党为保持其选举霸权地位,并未提出废除“10%门槛”的限制。

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没有弥补1982年宪法缺乏监督的弊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土耳其总统、宪法法院和执政党经常存在违宪行为,在2007年总统选举危机、2008年正义与发展党几乎被取缔的诉讼中都存在国家管理机构违宪的行为,这表明本应成为宪法监督对象的国家管理机关,却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订案并没有解决这一弊端,这是其宪法修订不彻底的重要表现。又如2010年宪法修正案中,正义与发展党借法治之名对宪法法院和最高法官与检察官委员会进行重塑,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执政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话语权,使人怀疑其目的是否真的是“将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正义与发展党的2010年宪法修正案弱化司法的独立地位,强化执政党政府的行政干预权,背离了民主政治体制下司法独立和法治倾向。2014年以来,正义与发展党凭借强大的选举优势赢得地方选举、总统选举和2015年大选,信心满满的埃尔多安总统努力通过正义与发展党控制的大国民议会以继续修宪、出台新宪法和推行总统制。尽管埃尔多安在谋求总统制的道路伴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但反对党对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的不满、执政党成员的腐败行为、库尔德人的暴力反抗运动、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无疑将影响其民主化举措的实施效果。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既是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也是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乃至出台新宪法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四、结 语

土耳其共和国在借鉴西方宪政理念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宪政体系。有学

^① Ceren Lord, “The Persistence of Turkey’s Majoritarian System of Government,” p. 241.

者指出,现代宪政理念对于宪法提出了双重任务。一方面,宪法需要在某个时刻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通过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防止后来政府部门的背离和宪法的随意改动。……另一方面,宪法需要在制定之后适应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宪法既要防止随意变动,又要主动适应变动,这是现代成文宪法的基本特点。^①所以,修宪是现代社 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土耳其 1982 年宪法基于政治动荡和军人掌权的特定背景,服务于稳定社会和整饬秩序的现实需要,体现了对土耳其民主政治框架的理性收缩。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1982 年宪法必然存在与时代发展相背离的历史局限性。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以摆脱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为前提,通过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努力突破 1982 年宪法确立的“被监护的民主政治”和凯末尔威权政治框架,旨在弱化军方特权地位、提升少数民族权利和自由、加强宪法对政党政治的限制,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部分完成了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民主政治目标,凸显了人民主权与成文宪法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一现代宪政体制的内在逻辑,人民主权的历史生命总是会冲破宪法文本对民主政治的限制,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修宪实践则体现了对现代宪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是,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在完善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同时,也通过宪法修正案强化了其选举霸权和优势地位,甚至出于权力博弈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惜违背宪法精神,呈现出与民主政治的悖论式发展趋向。现代政治的本质要求是民主政治或“承认的政治”,宪法是民主事实的法律化,而执政党是实践宪法准则和构建民主政治的重要政治力量。宪法、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融合是诸多国家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宪法修正案也是以实现该目标为宗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及效果表明,必须选择合适的宪法变迁路径,颁布与时俱进的宪法修正案,才能使宪法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执政党要在尊重宪法法律权威的同时,坚持依法执政和民主执政。这既是当前中东国家政治转型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依宪治国提供了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李 意)

^① 刘晗《宪法修正案与“法外修宪”:美国宪政变迁研究》,载《清华法治论衡》2013 年第 2 期,第 200 页。

near future.

Key Words U. S. ; European Union; Hamas; Palestinian-Israeli Issue

Author CHEN Tianshe , Ph. D. , Professor , School of History , Zhengzhou University

74 AKP'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Development of Turkish Democratic Politics

Abstract Turkey is the most democratic Islamic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The 1982 Constitution which is still in force is known for strengthening president's power , maintaining special authority of military , restricting the space of party politics and the freedom of civil rights , which makes Turkey authoritarian , statist and tutelary. When AKP came to power , it actively amends the 1982 constitution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utelary democracy. 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in 2004 weakened military power. 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in 2007 paved the way for direct election for president. The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in 2010 aimed at restructuring the national judici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rule of law and pluralism. Now , the AKP government is seeking a new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The AKP's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aim to weaken the function of Kemalism and construct plural national identity. They also prove the compatibility of modern Islamism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rough a series of constitution amendments , AKP becomes a dominant party in Turkey , which embodies the paradox of Turkish democratization.

Key Words Turkey; AKP;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Democratic Politics

Author LI Yanzhi , Associate Professor , School of History , Liaoning University

90 Egypt'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Dilemmas since the Middle East Upheavals

Abstract There were three phases in Egyptian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In the launching phase of democratization , the protest camp constituted by religious groups , liberal democrats and young protesters overthrew the rule of Hosni Mubarak , while the military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maintained their power. In the establishing phase of democratic system , the military and judicial departments temporarily allied with religious groups pushe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nd three elections. Two formers reserved their power and the latter won elections. In the operating phase of democratic system , while religious groups represented by Mohamed Morsi were keeping expanding power , the military , judicial departments , liberal democrats and young protesters formed a secular ally and subverted the morsi government.

Key Words Egypt; January 25 Revolutio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Democratization

Author DING Xuxiang , 2013 Ph. D. Candidate , School of Marxism , Peking University

114 On Jordan's Early Moderniz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Jordanian modernization in early stage is quite low. Viewed from its ideology , the recent Jordanian modernization is a kind of "Mixed Modernization". Perceived from its origin , Jordanian modernization is exogenous modernization. Jordan's early-stage modernization started from military modernization , and then extended to the political , social and other fields gradually. In the early stage of Jordanian modernization , colonialism played a duel role. On one hand , it acceler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ity of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 it awakened peopl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which led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colonial system.

Key Words Jordan; Mixed Modernization; Exogenous Modernization;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uthor LI Xi , Lecturer , Arabic Department ,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